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实践研究

覃士有

青海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青海省西宁市, 810008;

摘要: 新时代,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考验,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趋复杂。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理论内核, 结合该工作现实挑战, 阐释斗争精神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指出其蕴含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辩证智慧, 非简单对抗性思维。针对“西强我弱”国际传播格局、大数据“信息茧房”及 AIGC 治理难题, 需以斗争精神引领思潮、创新传播、建强队伍。通过分析“Z 世代”传播载体创新、“小切口”叙事实践等案例, 提出“以斗争促传播、以传播强认同”策略, 为该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 新时代;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意识形态安全

DOI: 10. 64216/3080-1494. 25. 10. 001

引言

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博弈更趋复杂”的双重挑战^[1]。一方面,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解构传统宣传格局, 形成“主体多元化、载体融合化、受众圈层化、信息碎片化”的泛传播场域,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被稀释的风险; 另一方面, 西方敌对势力借由技术优势和文化霸权, 持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以‘自由’‘民主’等旗号包装其价值观, 借助电影、游戏等载体灌输思想, 培植网络意见领袖制造舆情震荡”, 进一步加剧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斗争压力^[2]。

在此背景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重要性, 指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 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极端重要工作, 更需以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破解难题、开创新局^[3]。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并非简单的对抗思维, 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矛盾的斗争性, 蕴含维护人民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辩证智慧”, 其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实践, 既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路径^[4]。

从实践来看,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虽在“理论武装、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但仍面临“精神文化供给与人民需求不匹配、内宣外宣协同不足、传统方法与新技术适配性不强”等问题^[5]。因此, 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理论内核, 结合泛传播场域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演化特征, 探索斗争精神的实践路径, 不仅能为破解当前工作中的现实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更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根基、凝聚精神力量。

1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1.1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并非简单的对抗冲突思维, 其核心要义植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以科学性、人民性与辩证性的统一为内核, 始终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展开, 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与实践逻辑。从科学性维度来看,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 明确“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 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强调斗争是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事物向前演进的关键变量, 这种对斗争的认知并非主观臆断, 而是对社会矛盾运动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6]。其人民性维度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斗争的最终指向是“实现所有人的富裕”“为了人类解放”, 中国共产党传承这一特质,

将斗争精神与人民利益紧密绑定,强调“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凸显了斗争精神服务于人民福祉的价值取向。

而辩证性维度则进一步丰富了斗争精神的实践逻辑,它既包含“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对抗性斗争,如意识形态领域对错误思潮的坚决批判,也涵盖“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的非对抗性斗争,如文化交流中的求同存异、协商共建,这种辩证性恰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事物发展动力”这一唯物辩证法原理的生动体现。三者的统一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闭环:科学性为斗争提供规律指引,确保斗争不偏离正确方向;人民性为斗争注入价值灵魂,明确斗争的根本目的;辩证性为斗争赋予方法智慧,保障斗争高效推进。需特别澄清的是,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绝非“否定一切”的极端“斗争哲学”,而是“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的科学实践范式,始终以解决矛盾、推动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归宿^[8]。

1.2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明确无产阶级斗争目标,恩格斯强调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列宁结合革命实践,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须坚持意识形态斗争,推动其从理论走向实践。在中国化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斗争精神融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与统一战线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以斗争耐力推进“一化三改造”并筑牢思想根基;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强调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斗争,实现斗争精神创新。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斗争精神提升至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大将“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纳入“三个务必”,其内涵从领域、目标、方法上拓展,既坚守核心要义,又具鲜明时代特征。

2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斗争精神的价值彰显

2.1 应对“两个大局”的战略需求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交织的背景下,斗争精神成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支撑。从国际来看,西方敌对势力“凭借技术优势开展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通过“电影、游戏等载体灌输其价值观,培植网络意见领袖制造舆情震荡”,企图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需以斗争精神为武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导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8]。从国内来看,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面临“多元文化冲击、国民素质整体偏低”等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文化主导地位受到冲击、部分社会成员诚信缺失等,需通过斗争精神凝聚共识,“坚决同一切阻碍文化建设的负面因素作斗争”,为民族复兴筑牢思想根基。

2.2 破解“西强我弱”传播格局的现实需要

面对国际传播中“西强我弱”的格局,斗争精神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突破话语困境、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动力。当前,西方国家依托文化霸权“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削弱公众政治认同”,甚至将中国发展污名化为“中国威胁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需以斗争精神主动作为,一方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价值,如通过“Z世代”喜爱的短视频、游戏等载体,创新文化传播形式^[2];另一方面“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形成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如在国际舞台上生动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故事,以事实驳斥西方不实言论,打破其话语垄断^[1]。同时,针对“大数据算法导致的‘信息茧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带来的治理难题”,需以斗争精神创新传播技术与治理手段,如构建“主流媒体+新媒体”的融媒体矩阵,提升主流舆论的穿透力与影响力^[8]。

2.3 提升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

斗争精神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从文化传承来看,需通过斗争“去芜存菁”,既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歪曲抹黑,如批判“否定英雄烈士、歪曲党史国史”的错误言论,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将“天人合一”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宣传,彰显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从文化建设来

看,面对“精神文化供给良莠不齐、质量不高”的问题,需以斗争精神推动文化供给侧改革:在数量上,“增加精神文化供给的总体数量”,加快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如完善基层图书馆、文化馆等设施^[6];在质量上,“提升精神文化供给的质量水准”,打造如《觉醒年代》《长津湖》等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文化精品,以高质量文化产品增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5]。通过与文化领域突出问题的斗争,不断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为宣传思想工作注入持久动力。

3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斗争维度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处的环境更趋复杂,面临的斗争任务更趋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而意识形态领域作为斗争的重要战场,其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1]。

3.1 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形势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呈现出“国际博弈与国内挑战交织、传统方式与新型手段并存”的复杂态势,既需抵御外部渗透,又要应对内部多元思潮冲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

从国际层面上看,西方渗透与反渗透的长期博弈。西方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和文化霸权,将意识形态渗透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斗争形式更趋隐蔽、手段更趋多元。李俊(2024)提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等谬论持续发酵,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国际舆论场抹黑中国形象、干扰中国发展,加剧了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阻力,形成“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使我国在意识形态反渗透斗争中面临更大压力^[6]。从国内层面上看,多元思潮与网络空间的双重冲击。国内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为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调整,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与主流价值观产生碰撞,部分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出现弱化。王德召(2024)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借助网

络平台传播,冲击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其往往通过歪曲党史国史、抹黑英雄人物等方式,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4]。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斗争精神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在实践中,需创新宣传方式,张士海(2024)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宣传媒介,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例如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让主流声音穿透“信息茧房”^[3];同时,要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错误思潮“理直气壮地进行批判和纠正”,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健康态势。

3.2 社会思潮多元化与技术变革的双重挑战

除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斗争外,社会思潮多元化与技术变革的深度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难度,对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3.2.1 社会思潮多元化:主流价值观引领难度加大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使国内社会思潮呈现出“多元交织、复杂多样”的特征。张雯娟(2024)指出,部分自媒体“为流量刻意放大社会矛盾,消解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公信力”,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的蔓延,也弱化了集体意识和社会凝聚力,导致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下降^[5]。

3.2.2 技术变革: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双重影响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风险挑战。一方面,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使用户被同质化信息包围,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普及,催生了大量虚假新闻、深度伪造内容,徐菲(2024)认为,这类内容“增加了信息治理难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时效性与精准性提出更高要求”。此外,技术应用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导致部分群体难以有效获取主流信息,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引导的不均衡性^[1]。

3.3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斗争的主要维度界定

明确斗争的主要维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破解工作难题的前提。结合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需求,斗争可从理论、舆论、文化、技术四个核心

维度展开,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斗争体系。

3.3.1 理论斗争: 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理论斗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本,核心在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袁银传(2025)强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面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通过理论创新回应时代问题^[2]。

3.3.2 舆论斗争: 维护主流舆论场的主导权

随着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舆论斗争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斗争的关键在于“把握战略主动,锻炼斗争本领”,既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模糊认识,又要坚决批驳虚假信息、抵制负面舆论。具体实践中,可通过构建“官方舆论场的政治底线机制、民间舆论场的对话认同机制”,加强主流媒体与公众的互动,提升舆论引导的亲力和感染力;同时,完善舆情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对突发舆情快速反应、有效处置,防止负面舆论扩散蔓延。

3.3.3 文化斗争: 打破西方话语垄断, 提升文化软实力

文化斗争是增强国家话语权、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核心在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传播中国文化价值。在国际层面,需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价值,通过“小切口”叙事、“Z世代”传播载体创新等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破解西方“文化霸权”;在国内层面,要“去芜存菁”地对待外来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侵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3.3.4 技术斗争: 驾驭技术变革, 赋能意识形态工作

技术斗争的本质是“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相结合”,主动驾驭技术变革而非被动应对。一方面,要利用技术优势提升宣传效能,例如借助大数据分析把握受众需求,通过AIGC技术创新文化产品形态,增强主流内容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防范技术滥用带来的风险,建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技术治理体系,加强对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监管,确保技术应用符合意识形态安全要求。同时,建立AIGC内容溯源机制,通过区块链技术对AI生成的宣传内容进行全流程存证,确保内容可追溯、可监管;开发AI辅助审核系统,结合人工复核,提高虚假信息、有害内容的识别效率,破解AIGC带来的信息治理困境要缩小

“数字鸿沟”,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和主流信息向基层、向弱势群体覆盖,实现技术赋能与意识形态引领的统一。

4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实践,需严格对应理论、舆论、文化、技术四大斗争维度,将队伍建设的能力要求融入各维度实践,以“靶向施策”破解各领域难题,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4.1 聚焦理论斗争维度: 以理论武装强基固本, 锻造善辩能驳的工作队伍

理论斗争的核心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需通过思想淬炼与能力提升,让工作人员既“懂理论”又“会斗争”。深化理论学习,夯实斗争思想根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必修内容,构建“集中研讨+基层宣讲+自主学习”的立体化学习体系。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人员开展专题培训,重点提升其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使其能准确把握理论精髓,为批驳错误思潮、阐释主流价值提供坚实思想支撑。主动亮剑发声,提升理论斗争实效。鼓励工作人员围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结合社会热点与群众关切开展理论辨析。通过撰写理论评论、组织观点辩论赛、制作通俗解读视频等形式,系统批驳歪曲言论;同时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中的理论智慧,用群众易懂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实践,在斗争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4.2 聚焦舆论斗争维度: 以传播创新掌握主动, 培育懂媒善导的工作队伍

舆论斗争需顺应泛传播场域特征,通过传播方法创新与队伍能力建设,让主流声音占据舆论高地。构建全媒体矩阵,突破传播壁垒。推动工作人员掌握“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合运营技能,打造“主流媒体账号+社交平台IP+垂直领域自媒体”的传播矩阵。指导工作人员运用“小切口”叙事,围绕民生改善、科技创新等主题创作短视频、直播、互动图文等内容,精准匹配不同受众圈层需求,打破“信息茧房”,扩大主流舆论覆盖面。强化舆情处置能力,净化舆论环境。针对工作人员开展舆情监测、分析、处置专项培训,使其熟练运用舆情分析工具捕捉风险点,掌握“快速响

应、精准引导、有效化解”的工作方法。建立“工作人员+网络志愿者”协同机制，由工作人员牵头，引导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同频共振，及时清理虚假信息、抵制恶意炒作，维护清朗网络舆论生态

4.3 聚焦文化斗争维度：以文化赋能凝聚认同，打造创传播的工作队伍

文化斗争需以优质文化供给破局，通过提升队伍的文化创作与传播能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与认同感。打造精品文化产品，激发内生认同。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联合文化创作者开发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产品。指导工作人员掌握“文化+科技”融合技能，将传统文物、红色故事转化为数字展览、沉浸式体验、动漫游戏等新型形态，吸引青年群体参与；同时策划社区文化节、乡村文艺展演等群众性活动，让工作人员带动群众参与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认同感。创新国际传播方式，打破话语垄断。提升工作人员的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指导其运用国际化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依托“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国际电影节等平台，由工作人员牵头策划文化展示活动，用海外受众易懂的表达方式传递中华文化价值；针对“中国威胁论”等谬论，组织工作人员撰写国际评论、开展对话交流，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与国际话语权

4.4 聚焦技术斗争维度：以技术驾驭防范风险，建设懂技善用的工作队伍

技术斗争需主动适应技术变革，通过提升队伍的技术应用与风险把控能力，让技术服务于意识形态安全。掌握技术工具，赋能宣传实践。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AIGC等技术专项培训，使工作人员熟练运用算法分析受众需求、生成优质内容——如借助AIGC技术批量创作政策解读短视频、科普图文，利用大数据定位舆情热点；同时指导工作人员搭建技术化传播平台，如开发交互式理论学习小程序、数字文化展厅，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精准性与效率。强化风险防控，守住安全底线。建立工作人员技术应用审核责任制，要求其AI生成内容、算法推荐结果进行价值观把关，防止出现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组织工作人员参与技术伦理研究，制定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技术应用规范，针对“信

息茧房”“深度伪造”等风险，设计技术干预方案，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建设，避免技术滥用带来的负面影响。

5 结论

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不仅是应对“西强我弱”国际传播格局、破解技术变革难题的战略工具，更是提升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的精神纽带。实践中，需坚持“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统一：既要在意识形态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又要在文化传播中注重策略创新，以“小切口”叙事、“Z世代”载体等方式增强传播实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斗争精神的具体实践形态，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宣传思想文化体系提供更精准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 [1]徐菲.基于泛传播场域的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党性原则探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1):93-96.
- [2]袁银传,邵雪.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本质意蕴、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06):23-32.
- [3]张士海,薛体伟.新时代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经验[J].理论学刊,2024(05):36-42.
- [4]王德召,黄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生成逻辑[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24):34-37.
- [5]张雯娟,左亚文.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以人民为中心”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6):8-10.
- [6]李俊,刘银.弘扬斗争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05):114-125.
- [7]王晓光.习近平关于发扬斗争精神重要论述研究[J].理论学刊,2025(04):45-55.
- [8]路海玲,孔令婷,吕坤.正确把握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六对辩证关系[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06):18-20,24.

作者信息：覃士有，男，2004.7.28，汉族，湖北省宜昌市，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